

以自圓其說，但解釋力不足。所以不得不說，雖然本書以一個地域觀念作為題名，卻始終沒有完滿地處理「江南」觀念在其敘述脈絡中的定位，一旦離開了對「南」、「北」意象的討論，進入到士林與皇帝在「文質之辨」的「合流」趨勢時，本書的討論就變得引人入勝。

本書從一種不同的角度理解清初士林學風「質樸」、「考據」等變化趨勢。他分析呂留良、周永年、章學誠等案例，都試圖說明學風的轉變是一種「士林」與皇權政治的合流，而非「士林」對皇權政治的逃避。基於這樣的分析路徑，作者改變了有關「經世」思想的傳統觀念。他認為，在康雍乾三朝這樣的承平世，「經世」思想也始終存在着。「經世」思想並非一定是迫於外界壓力的產物，更應被理解為支撐清代皇權政治的「治道」的重要依託。這是發前人所未發的可貴之處，由此引發的問題更有趣味，即思想與政治態勢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說，一些被後人認為較為「現代」的思想在怎樣的政治態勢下更容易產生。「經世」思想之所以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課題，與「現代化」以及19世紀中國命運的轉折等「情結」密切相關。為思考這一問題提供新的角度與思路，可能作者的最終結論並不重要了。

總體說來，本書雖以「江南」為題目，但重點落在分析士林與皇權的「合流」之勢，更進一步說，對這種「合流」之勢的描述，似乎是在映射20世紀80年代知識界的大同盟如何在90年代分化，以及隨後在各種因素下，一大批知識份子迅速體制內化，形成了知識份子與政府的「共謀」。80年代那種知識份子站在體制外仗義執言的「士氣」愈弱，而知識份子自我審查，努力為體制所認同的「世風」日盛。楊念群所強調的「南宋—晚明」歷史反思模式，也許是合於其回望近十餘年來學界種種變化時慨歎的心境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作者所講的這個故事不僅未必是關於江南的，甚至未必是關於清代士林的。

趙思淵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山田賢，《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會史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322頁。

移民是塑造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國內相關研究成果豐富，代表性著作為葛劍雄主編的六卷本《中國移民史》，該書重點集中於移民的動機、時

間、規模、路徑等方面，對於移民的定居及影響着墨不多，這可算是國內移民史研究的整體特徵。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轉向地域社會論，本書作者山田賢是該理論的積極擁護者。本書由作者20世紀80、90年代陸續發表的論文集合而成，集中反映了山田賢的地域社會論觀點。在書中，作者從流動人口的眼光審視移民問題，將流動視為孕育新秩序的紐帶而非對現有秩序的脫離，以微觀視角論述移民的定居和地域社會形成史，以及移民秩序整合中的矛盾衝突，展示了有別於國內學者的移民史研究路徑。

除了序章、結語及第二章後的附編之外，正文共分七章，分為「移民和地域整合」、「移民與地域變動」、「移民社會的終結」三大板塊。在序章中，作者首先提出了研究川陝鄂三省交界地區移民問題的上述新視角。以此為前提，作者對唐宋、明清時期的移民史，移民社會中地域精英的動向及嘉慶白蓮教造反等相關問題作了學術史回顧，提出了本書的主要考察內容。

第一、二章論述移民的定居與地域整合的方式。第一章先介紹三省交界地帶移民的概況及定居的過程，次以四川省雲陽縣為例具體論述移民社會之展開。三省交界地帶移民自清初起，到乾隆時期達到高潮，其主要來自以湖廣為中心的過剩人口，他們由季節性往來的商業活動轉而獲得土地或耕種權、走向定居。移民在定居初期以語言、習俗為紐帶形成同鄉雜姓集團（同鄉村落），隨着內部氏族的成長，同鄉村落走向解體、分裂而形成單姓集團（同姓村落）。同鄉結合的形態為會館，同族結合的形式為宗祠和山寨。定居形態由同鄉村落向同姓村落轉變的過程，也是地域社會秩序向心聚攏重構的過程。第二章考察雲陽涂氏的發展軌跡，梳理出移民社會走向穩定的機制所在。作者從兩方面出發：一、涂氏依靠同鄉組織壟斷米穀貿易來獲利，以此管道走向定居與宗族之路；二、涂氏通過與地域內有勢力的大姓締結婚姻關係，實現宗族聯合，上升成為雲陽大姓。

第三、四兩章從社會、思想層面，探析白蓮教產生的原因，論述移民秩序整合中的矛盾。第三章從移民社會的地域變動方面，探求白蓮教造反的社會根源。山田賢認為，「造反主體並非先天地對立於定居者的『共同體』之外，而是在地域社會開始向某種秩序統合、凝聚之時，由其內部析出的」（頁136），白蓮教造反集團的析出和有實力的移民地主的生成是相輔相成的兩極。白蓮教造反者主要是遭受移民地主經濟壓迫、未能實現宗族轉化的山區居住者，造反的原因在於他們與移民地主間圍繞土地所有、商業活動的矛盾激化。第四章進一步解釋白蓮教的教義和宗教禮儀。白蓮教的教義預言現存秩序的毀滅，唯有回歸無生老母，才能獲得救濟。這實際上有肢解現存

社會秩序、試圖建立新的正統秩序的隱喻。白蓮教還通過簸箕、拜燈、誦唱靈文等宗教禮儀，將教徒內心關於「死與再生」、「暗與光」的幻想具象化。當白蓮教教義所帶來的這些幻想與蓄積於地域社會內部的矛盾相遇，最終導致了嘉慶白蓮教造反。

第五至七章討論移民社會的終結。第五章論述清代四川的地域精英「紳糧」的產生及原因。山田賢認為，隨着四川地域開發的成熟，僵化的王朝行政、財政體制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行政事務需要，促使具有地方財政性質的公局出現。紳糧正是參與執行地方行政事務的公局運營的有實力者。通過公局—紳糧體制，地方政府填補了因行政、財政能力不足產生的空白，紳糧則以此獲得地域社會的行政權乃至支配權。第六章以四川合州為對象，具體探討公局體制扎根於地域社會的過程。公局體制的出現，一方面來自地方行政能力空白所提供的契機，另一方面則是善舉的範圍由族、場鎮擴大到州縣的結果。通過同鄉、婚姻、朋友等各種社會關係重疊編織的、以州縣為範圍締結的宗族聯合體，對公局的創設和維持發揮了基礎性作用。所以，公局—紳糧體制的出現，意味着高流動性的移民社會走向穩定秩序。第七章探析孕育紅燈教造反的社會土壤。作者認為，紅燈教造反是在清末陷入社會動搖期，傳統的正統觀念受到耶穌教會的擠壓而淪為基層文化時，廣大的非精英層為實現正統觀念的復權，利用關帝、楊四將軍等體現傳統觀念的神祇，試圖重建傳統的、正統的秩序的運動。與白蓮教毀滅現存秩序、回歸無生老母的思想相比，紅燈教意味着移民社會的終結。

概而言之，山田賢將移民社會的地域整合分為同鄉聚居、宗族形成、地域精英（公局—紳糧體制）三個階段。地域整合的過程也是移民社會形成中心、重構秩序的過程，整合中的失敗者成為非精英層，最終走上反整合的道路，白蓮教造反即是未能實現宗族轉化的非精英層發起的。紅燈教造反又不同，它是在地域整合完成後，接受傳統秩序的非精英層對於地域精英背離傳統價值規範行為的反抗。

作為移民史的微觀研究，作者的眼光並不限於移民，而是將移民與地區開發、商業活動、地方動亂諸因素，放在地域社會形成史中進行考察，以求對地域社會內部發生的重要事件進行合理解釋。作者論述的同鄉結合、婚姻圈、宗族聯合等社會關係網，形成了地域社會的聚合力。由於地域社會論者常以具體某一地方為切入點論述問題，所以常被批評為過分關注地方事件而忽視國家對地方的影響。山田賢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四川東部地區，但這背後是作者對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統合模式的關注，即前言中所說的「傳統中國社

會是如何由許多錯綜複雜的關係交織凝結而成的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前言頁3)。這種問題意識，應該是戰後日本學者對中國社會的共同體問題關注的延續。若將其置於戰後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發展脈絡中，則可看出作者在商品生產與地主制、民眾鬥爭史、鄉紳統治論等研究基礎上的新解釋。所以，地域社會論與其說是一種闡釋歷史的新理論，不如說是將歷史現象置於具體的地域社會網絡中進行闡釋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當然，本書也有值得商榷的部份。如第五章論述公局出現的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地域開發成熟後，地方財政收入相對於行政事務增加的匱乏，而導致匱乏的重要原因，作者認為是清代的原額主義財政使增加賦稅變得困難。但事實上，清代的田賦收入在地方的留存額很少，地方財政自清初即處於匱乏狀態。地方收入主要來自火耗、陋規等非正式財政體系以及清末的厘金，原額主義更多的只是體現王朝的仁政，對於地方財政的影響並沒有作者所認為的那麼重要。另外一些論證略顯薄弱。如第三章第三節論述造反的原因時，作者認為這與胥吏對山區定居者的壓迫有關，並依據《雲陽涂氏族譜》提出胥吏多為移民地主，最後推演出造反原因是移民地主與山區定居者之間的矛盾。此處僅以雲陽大姓涂氏為例論證胥吏多為移民地主，似乎略顯單薄。儘管如此，本書仍不失為一項富有啟發性的探索，對中國移民史、地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鄭俊華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林滿紅，《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318頁。

《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一書的初稿是林滿紅1989年提交給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底由哈佛大學出版了英文本，2011年分別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奉獻由作者深度參譯的中文本。作者強調有機的整體史，這使得她力圖打破學科和研究領域的人為分割，整合經濟史、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也使得她不只是關注單一國家的分析，而是注重中國和世界的聯繫。此外，她還受到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關注經濟現象和行為背後的思想模式(頁15)。